

ISSN 1997-3721

師大 **台灣史** 學報 No. 10

2017年12月31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

蔡錦堂

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生初探*

蔡錦堂**

摘要

本論文以目前新竹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新竹高中)所藏,原日治時期的「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學籍簿」,作為研究的主要資料之一,以了解日治時期的臺北高等學校學生中,出身於新竹中學校的臺、日籍學生們,其菁英培育關係與過程,冀使臺灣近代教育中菁英養成的面貌更臻清晰。

臺北高等學校為現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是戰前日本培育菁英的38所舊制高等學校之一,也是全臺灣唯一的高等學校。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原則上可以免試直升當時全臺灣也只有一所的臺北帝國大學,或者進入東京、京都等帝國大學就讀。

臺北高校的高等科每年臺、日人合計只收120名學生,當時全臺灣共有17所中學校,入學考試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由臺、日人共學的新竹中學校,與臺北高校同樣創立於大正11年(1922),至昭和20年(1945)戰爭結束止,20餘屆的臺灣人畢業生中,共有71名考入臺北高校,日本學生少

* 本論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3-017 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於此數目。

本論文以新竹高級中學所藏的「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學籍簿」作為統計分析的主要史料，再配合臺北高校與新竹中學校目前尚存的圖書，以及教育制度、課程等，建構這兩所中學校、高等學校連貫的菁英養成關係與內涵。

關鍵字：臺北高等學校、新竹中學校、學籍簿、菁英、中學校

一、前言

本論文擬針對日本治臺時期「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等學校」學生，以目前尚存的新竹中學校的學籍簿作為分析素材，進行初步探討。

大正 11 年（1922）4 月 23 日，舊制「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以下簡稱臺北高校）舉行入學典禮，開始了尋常科 4 年、高等科 3 年的 7 年制臺北高校菁英養成教育。從大正 11 年（1922）到 2017 年正值創校 95 週年，臺北高校的菁英養成教育是值得吾人加以細密探究的。

1990 年以來，日本學者所澤潤持續以日治時期臺灣的菁英為對象進行口述訪談，其中也包括了幾位臺北高校的學生與教師。鄭麗玲則在臺北帝國大學的研究中，論及臺北高校與臺北帝大預科的銜接性。但是前述兩者均非完全針對臺北高校本身進行探討，臺北高校只是他（她）們研究中的附屬品。¹

筆者於 10 年前因緣際會開始針對長期被忽視、並被誤認為只是如同戰後一般普通高中的舊制臺北高校進行研究，而在 2007 年撰寫了〈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一文。² 之後，筆者也持續指導學生撰寫以臺北高校為議題的碩博士論文，例如徐聖凱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北高等學校之研究》、津田勤子的博士論文〈戰時下臺日高校生的文藝活動——以臺北高等學校回覽雜誌《雲葉》與《杏》為例〉（2016 年）、徐紹綱的碩士論文〈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召與實態〉（2017 年），以及目前正在撰稿中的碩士論文「臺高灣生與日本・琉球・臺灣的邂逅——以川平朝清家族為中心」等。³ 此外，筆者亦與徐聖凱合作，對臺北高校同學會前

¹ 參見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頁 7-10。

²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亞東關係協會編，《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外交部，2007），頁 49-59；並收於前述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頁 313-327。

³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津田勤子，〈戰爭時期臺日高校生文藝活動——以臺北高等學校傳閱雜誌《雲葉》與《杏》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津田勤子博士論文（日文版）

會長黃伯超進行前後 19 次的口述訪談，出版了《黃伯超先生傳：臺灣營養學領航人·本土醫學教育改革先驅》一書；接著筆者也在 2015 年承立法院的委託，編著出版了臺北高校第 5 期生劉潤才的傳記《立法院院長劉潤才傳記》；⁴ 2011 年與 2013 年又連續寫了〈陳增福家族菁英群與臺北高等學校初探〉，以及衍生出的論文〈辯護士陳（穎川）增福家族的日本內地人·臺灣人身分變換與改姓名問題探討〉，分析陳氏家族擁有多達 5 位臺北高校生（最高記錄）的狀況與原因。⁵

但是以上的著作或研究，大致上是環繞著臺北高校本身或是其校友所進行的研究，而鄭麗玲的研究是以臺北高校升學「上游」的臺北帝大為研究主軸，順便涉及臺北高校。至於到底是哪些「下游」的「中學校」學生，能夠考進臺北高校，似乎較無人進行關注。

筆者在幾年以前，曾協助臺中的國立臺中圖書館（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進行原日治時期臺南一中、臺南二中、新竹中學校的圖書數位化計畫審議，偶然得知現新竹高中尚留存日治時期新竹中學校學籍簿，因此促使筆者思考或許可以藉由這些學籍簿資料，探討分析「下游」的新竹中學校與「上游」的臺北高校間的關係，這是本論文撰寫的初步動機與由來。

戰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承繼了臺北高校的校舍、建築、圖書、文件等，當然，如果藉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所接收的臺北高校學籍簿，去進行分析或許更為迅速方便。問題是臺灣師範大學（當時為師範學院）所接收的臺北高校學籍

已正式出版，津田勤子，《戰時下台湾の高等学校生と文芸：旧制台北高等学校『雲葉』と『杏』雜誌から見るエリート学生達の精神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7）。徐紹綱，〈臺北高等學校學徒兵的徵召與實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⁴ 黃伯超口述、蔡錦堂主訪、徐聖凱撰著，《黃伯超先生傳：臺灣營養學研究領航人·本土醫學教育改革先驅》（臺北：前衛出版社，2012）；蔡錦堂，《立法院院長劉潤才傳記》（臺中：立法院議政博物館，2015）。

⁵ 蔡錦堂，〈陳增福家族菁英群與臺北高等學校初探〉，《臺灣學研究》12（2011 年 12 月），頁 1-16；蔡錦堂，〈辯護士陳（穎川）增福家族的日本內地人·臺灣人身分變換與改姓名問題探討〉，收於李玉瑾主編，《近代東亞中的臺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圖書館，2013），頁 26-36。

簿資料，以及原臺北高校的學生戶籍謄本、教務日誌、生徒履歷、編級考試、成績表等共 195 冊極重要的資料，在 1950 年左右因委由當時的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現師大附中）接收保管，但附中表示「本校設備簡陋，今後空襲堪慮，接收大量文件頗有無處儲藏之苦……部分文卷已失去時效，似均無保存價值，擬懇呈廳准予銷毀……」，透過師範學院報臺灣省教育廳擬予銷毀。當時教育廳並不允許，但隔年 1951 年 7 月 9 日，教育廳函覆「將有保存價值部分由附中接收保管，無保存價值者經登記造冊後就地焚燬」。⁶ 因此，就目前所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師大附中均已不存在臺北高校的學籍簿等資料。這或許也是進行臺北高校研究的一大侷限。

以下先就「臺北高等學校」與「新竹中學校」的設立作簡單的陳述。

二、臺北高校與新竹中學校的設立

（一）臺北高校的設立

大正 8 年（1919）總督府正式頒佈「臺灣教育令」，以取代日本統治以來的教育「無方針主義」，這是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殖民地政策的變化。因為這個教育令的頒佈，使「本島人」（按，臺灣人，以下同）從初等普通教育到高等普通教育（中等學校）、專門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有了較為完整的系統，其最大的變化是增設一些中等教育機關，除原有男子高等普通學校（即臺中中學校）之外，增設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工業・商業・農業學校、農林・商業專門學校，並將總督府醫學校改為預科、本科各 4 年的 8 年制醫學專門學校，國語學校改成 5 年制臺北師範學校。⁷ 不過雖然如此，

⁶ 「為據請燒毀前臺北高級中學部份文卷一節核復知照並轉知由」，《師大檔案》，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檔號 0390000674-01；「為前臺北高級中學檔案處理辦法電希遵照由」，檔號 0400000991-02。

⁷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頁 605-611。

比較起「內地人」（按，日本人，以下同）的教育機關以及升學管道，臺灣人仍然是較為低下且不足的。

大正 11 年（1922），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次郎實施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政策，重新制定新「臺灣教育令」。其中最重大的改變是，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臺灣人與日本人「內臺共學」制度；而公學校與小學校雖然仍維持原有差別系統，但是本島人常用國語（日本語）的家庭子弟，可以進入小學校就讀；而中等教育以上的學制依日本本國的學制與法規，亦即依循中學校令「高等學校令、實業學校令、專門學校令、大學令來實施，這使得臺灣中等以上教育制度可以與日本本國銜接，有利於臺灣人子弟在臺灣或到日本尋求更高階的升學教育。⁸ 因為這個新「臺灣教育令」的實施，臺灣正式設立了兩大培育菁英的高等教育機構：「臺北高等學校」與「臺北帝國大學」。

臺北高等學校是大正 11 年（1922）依「高等學校令」所設立的當時臺灣唯一的高等學校（即高級中學），而臺北帝國大學是依「帝國大學令」所設立臺灣唯一的帝國大學，在形式上二者乃是位階不同的獨立學校，但實質上卻是「一貫」的，也就是說學生從臺北高校畢業後，原則上「不用考試」就可以全員直接申請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戰前全日本國僅有 38 所高等學校、9 所帝國大學（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朝鮮京城、臺北、大阪、名古屋），是當時日本為了培育國家高級官僚、頂尖大學教授研究者、社會領導階層而設置的菁英養成機構。這 38 所戰後被稱為「舊制高校」的高等學校，雖然具有獨立學校的地位，實際上帶有「帝國大學預科」的性格，其畢業生欲進入帝國大學，大多數不需要經過考試（東京帝大、京都帝大及少數帝大學部除外）。換句話說，只要進入「舊制高校」，幾乎等於保證可以進入帝國大學。舊制高校可以說是帝大菁英的先期養成所，更是日本未來官界、政界、財經界、學術界等重要人才的培養皿。臺北高校是唯一設置於亞熱帶地區的高校（如果暫不計昭和 16 年（1941）設立、昭和 20 年（1945）廢校的「臺北帝國大學預科」

⁸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651-659。

的話)，也是全日本共計 10 所「7 年制高校」中的一所。⁹ 所謂 7 年制高校，是指「尋常科」（中學程度）4 年，加上「高等科」（高中）3 年共 7 年，完成尋常科 4 年學業後可直升高等科，不必經過考試，而高等科畢業後也可不經考試直升帝國大學（除了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或部分入學競爭激烈的學部外）。因此 7 年制高校最大的魅力在於極端減少了入學考試，小學畢業如能進入 7 年制高校尋常科，幾乎等於「直通帝大」，一次入學考試決定終身前途。¹⁰

臺北高校尋常科於大正 11 年（1922）開始招生，每年招生約 40 名，第一年招收一年級與二年級生，作為 3 年後（1925）高等科成立之準備。招生名額臺、日人相當的懸殊，依據資料計算，臺北高校（含終戰時仍在學者共 23 屆）尋常科臺灣人總數為 91 人，平均每屆錄取 4 人，最高為第 6、8、16、21 屆各 6 人，第 1 屆 0 人，第 2 屆 2 人，第 3 屆 1 人。¹¹ 換句話說，臺灣人初等教育（公學校與小學校）畢業生，每年必須是考上全臺灣前 6 名甚至更前面者，才有可能進入臺北高校的尋常科，困難度極高。大正 14 年（1925）臺北高校高等科（3 年制）開始招生，分文、理兩科，又依主修之外語不同而分甲、乙兩類，甲類以英語為第一外語，德語為第二外語；乙類則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文甲、文乙、理甲、理乙共 4 班，每班招生名額約 40 名，一年共招生約 160 名，扣除從尋常科直升的大約 40 名學生後，每年招生約 120 名。到 1946 年 9 月止共 21 屆的臺北高校畢業生總數為 2,627 名，其中臺灣人有 654 名，約佔總人數的 24.9%。臺灣人平均每年能考入臺北高校高等科者不到 30 名，這些學生除來自尋常科之外，多是來自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

⁹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頁 50。

¹⁰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頁 52。

¹¹ 參照吳建堂編，《臺高會名錄》（臺北：臺高會，1982）。

校、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花蓮港廳立花蓮港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三中學校、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四中學校（按設立時間序）等臺灣各地頂尖中等學校的頂尖學生，角逐區區 30 個名額，因此被認為通過臺北高校考試，是全臺灣升學的最大難關，稱臺北高校的學生是「菁英中的菁英」並不為過。¹² 自大正 14 年（1925）起，臺北高校就取代了日本統治前半期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全臺灣頂尖菁英的養成所，而這些菁英也成為臺灣未來（包括戰後）社會領導階層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由於舊制高校以男性之高等普通教育為主旨，因此臺北高校亦是只有男性才能入學。如前述，臺北高校分為文甲、文乙、理甲、理乙四班，文科生進入帝大是就讀文學、法學、經濟學與商學等學部，理科則以帝大的醫學、理學、工學、農學部為目標。臺灣人以考入理乙者為最多，目的是進入帝國大學的醫學部，將來可進行醫學研究或當開業醫生，除了在社會上有地位聲望、生活有保障，亦容易成為社會領導階層，這種傾向延續了日治前半期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者成為臺灣近代社會領導階層的模式。

根據「高等學校規程」，高等科文科的課程有：修身、國語及漢文、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歷史、地理、哲學概說、心理及論理、法制及經濟、數學、自然科學、體操；理科的課程為：修身、國語及漢文、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及動物、礦物及地質、心理、法制及經濟、圖畫、體操。無論文科或理科，第一與第二外語課程均佔有相當重的比例。¹³

根據臺高學生回憶錄：「以文科而言，光德文課，一星期即有 11 個小時；英文為 5 小時；國語（日語）6、7 個小時。合計超過 22 個小時以上，其受重視程度，於此可見。而其原因，老師曾做過說明：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

¹²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頁 52-53。

¹³ 高橋佐門，《旧制高等学校全史》（東京：時潮社，1986），頁 651。

備兩種以上外國語文的能力，其一，要能讀能寫；另外，至少能讀。其理想不僅傳播知識而已，更希望藉此培養國際性見識。」¹⁴「高校這段教育，是相當可貴的；可以放浪形骸，可以不修邊幅，可以自由思考問題，懂得比較、探索中、日不同的文化本質，在差異與矛盾中，尋求相同劃一。」¹⁵高校生可以「放浪形骸」、「不修邊幅」是相當有名的，身著「弊（敝）衣破帽」，足踏「高齒下駄（木屐）」闊步行走，正是大正末期以迄昭和初期日本社會對高校生的一般印象。長髮、蓬髮、腰際再繫條長手巾，秋冬加件黑色斗蓬（マント），所謂的「蛮カラ」風——相對於西洋紳士風的「ハイカラ（High Collar）」——於焉成形。¹⁶但是這種「弊衣破帽」、「放浪形骸」的「蛮カラ」學風，並非臺北高校或一般舊制高校唯一的文化，相對地由於「自由」、能賦予高校生「自治」（包括寄宿之「寮」的生活管理），這些高校菁英三年間的學習成果亦是值得注目的。

1945年隨著戰爭的結束，臺北高校亦為國民政府所接收，12月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1946年10月，因臺灣的學校制度改變，臺北高級中學第20期學生直接編入國立臺灣大學2年級，21期生編入1年級，臺北高校至此正式廢校。¹⁷

舊制臺北高校25年歷史中，確實培養出許許多多臺、日傑出人才。以日本方面而言，臺灣文史學界著名的：鹿野忠雄、東嘉生、濱田隼雄、國分直一、中村孝志、中村地平之外，在政界、商界、醫學界、法學界、學術界等各領域赫赫有名者多不勝數。臺灣方面有：李登輝、辜振甫、徐慶鐘、曹欽源、宋進英、蔡章麟、魏火曜、吳守禮、戴炎輝、陳新安、周財源、林朝榮、洪壽南、劉潤才、黃啟瑞、黃得時、周百鍊、黃彰輝、張漢裕、楊華玉、邱仕榮、蔣松

¹⁴ 張文義，《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1996），頁75-76。

¹⁵ 黃天才、黃肇珩著，《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臺北：聯經出版，2005），頁30。

¹⁶ 曹永洋，《噶瑪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32。

¹⁷ 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頁58。

輝、余錦泉、李鎮源、林金生、許強、楊基銓、彭明聰、張有忠、宋瑞樓、張冬芳、陳世榮、陳五福、林挺生、杜詩綿、楊思標、王育霖、蘇瑞麟、許子秋、林宗義、郭琇琮、江萬煊、蘇銀河、楊雪樵、賴永祥、翁通楹、柯德三、郭維租、王育德、邱永漢、楊照雄、梁鑛琪、楊雪舫、陳政德、施純仁、杜慶壽、林宗毅、吳建堂、張寬敏、李悌元、黃伯超、莊徵華、陳萬益、辜寬敏、盧焜熙……等等。這裡面有後來貴為總統者，有五院院長或副院長、部長、市長、大法官、財經界領導者、學術界人士、文學家、語言學家、法學者、名律師，也有許多著名醫師，以及臺大醫學院院長、WHO 顧問等等。當然也有王育霖、胡鑫麟、許強、郭琇琮等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王育德之類的國民黨主政下的黑名單人士。¹⁸

(二) 中學校的設立

日治時期在臺灣最先設立的中等教育學校，是明治 31 年（1898）3 月以總督府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而設立的尋常中學校，其隔年開始招收學生 10 人，但只限於內地人男子。此尋常中學校於明治 40 年（1907）5 月，因中學校官制的公布而成為獨立中學——「臺灣總督府中學校」，這就是後來的「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的前身。¹⁹ 大正 3 年（1914）5 月，因應「勅令 82 號」在臺南成立「臺灣總督府臺南中學校」（即後來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之後，設立於臺北的「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即改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北中學校」，於是臺灣南北各有一所供內地人男子就讀的中學校。²⁰ 但是本島人能夠就讀的中等學校至大正 3 年（1914）仍然闕如。

本島人男子中等教育的設立，是由於大正 3 年（1914）林獻堂、辜顯榮等中部臺灣人士紳募集款項，向總督府請願設立中學校，總督府乃在大正 4 年

¹⁸ 整理自蔡錦堂，〈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頁 49-59。

¹⁹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 48。

²⁰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頁 335。

(1915) 2月公布「臺灣公立學校官制」，准許設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供本島人子弟在公學校畢業之後得以進學就讀，但是修業年限僅4年，較內地人就讀的臺北、臺南中學校少一年，此即後來的「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²¹

大正11年(1922)新「臺灣教育令」頒佈後，中等以上學校得以內地人、本島人共學的同時，修業年限亦全部改為5年，同時也在各個地方州增設中學校，並將總督府官立中學校移至地方州管轄，成為公立中學校。大正11年(1922)4月全島共新設了各地方州立的：臺北第二中學校、新竹中學校、臺中第二中學校、臺南第二中學校、高雄中學校等計5所，如包括之前已設立的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南第一中學校、臺中第一中學校，到大正11年(1922)全臺共有8所中學校。²² 同一時間，包括尋常科(等同中學)4年與高等科(等同高中)3年的7年制臺北高等學校亦告成立，臺北高校高等科即成為以上這8所中學校畢業生在臺灣的進學學校。

接著大正13年(1924)4月嘉義中學校設立，昭和2年(1927)臺灣最北端的基隆中學校新設，昭和11年(1936)6月花蓮港中學校設置，昭和12年(1937)4月臺北第三中學校成立，隔年的昭和13年(1938)4月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設置，昭和16年(1941)4月臺北第四中學校設立，同時臺東廳立臺東中學校亦成立，戰爭激烈期的昭和17年(1942)4月，臺北州立宜蘭中學校與臺中州立彰化中學校亦設置，²³ 不過最後設立的這二所中學校或許到戰爭結束都沒有產生畢業生。1945年為止，日本統治者在臺灣所設立的男子就學中學校總數共有17所。

另外，大正11年(1922)依新「臺灣教育令」的公布，「私立學校規則」也制定，日後李登輝中學時期所就讀的淡水中學校，即是其中的一所私立中等

²¹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頁49。

²²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十八編》(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頁145-161。

²³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附錄臺灣教育年表，頁28-42。

學校。依規則私立學校亦等同公立學校之原則，因此淡水中學校出身的李登輝，也能報考臺北高等學校，並合格通過成為臺北高校生。

(三) 新竹中學校的設置

在上述的 17 所中學校當中，次於臺北一中、臺南一中、臺中一中這 3 所中學校之後，依「臺灣公立中學校官制」於大正 11 年（1922）增設了臺北第二中學校、新竹中學校、臺中第二中學校、臺南第二中學校、高雄中學校共五所。新竹中學校即是這 5 所中的一所，正式全名為「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

新竹中學校於大正 11 年（1922）4 月 1 日取得認可成立（與臺北高校同一年成立），4 月 25 日舉行開校式與入學式，初期校舍尚未落成前，暫時使用新竹公學校一部分的校地與校舍。同年 11 月 2 日於新竹街東門外的新建校舍完工，即行移轉至新校舍；接著在大正 14 年（1925）底，因新竹街內赤土崎的新校舍落成，再行移轉到赤土崎，而將原校舍轉撥新設立的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使用。校地位於十八尖山山麓，鄰近原新竹公園與水道水源地。²⁴

新竹中學校自大正 11 年迄昭和 20 年（1922-1945）前後共 6 任校長，第一任是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的大木俊九郎，第二任東京高等師範國語漢文科畢業的荻阪進治，第三任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的志波俊夫，第四任東京高等師範博物科出身的深井米次郎，第五任廣島高等師範國語漢文科畢業的松井實，第六任的三屋秋策也是東京高等師範博物科出身。²⁵ 新竹中學校的教職員當中，有兩位臺灣人，一位是張棟蘭，戰後曾經在臺灣師範大學擔任英文系教授，另一位是范德煥（相關資料不詳）。²⁶

新竹中學校於大正 11 年（1922）3 月 18 日開始招募一年級新生，第一年

²⁴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新竹：新竹街役場，1926），頁 173-177。

²⁵ 津田定次郎，〈竹中六人の校長先生〉，《竹葉會會報》5（1971 年 12 月）。根據《竹葉會會報》第 5 號，上面記載松井實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國語漢文科。

²⁶ 羅慶謀，〈張棟蘭先生七秩晉一壽宴記〉，《竹葉會會報》5（1971 年 12 月）。《竹葉會會員名簿》，1978 年，頁 3-4。

約招募 100 名，來應考者有新竹州 448 名、臺北州 56 名、臺中州 48 名、臺南州 15 名、其他若干名。²⁷ 入學考試科目有：國語（日本語）、算術、日本地理、理科四個科目，基本上依小學校畢業的程度測驗，因此對公學校畢業者較為不利；另外尚須加考「口頭試問」（面試），以及進行身體檢查。²⁸ 根據資料，第一年通過測驗入學者，新竹州 60 名、臺北州 24 名、臺中州 10 名、臺南州 4 名、其他若干名。可見應考與通過測驗者均以當地的新竹州為最多數，其次為跨州應考的臺北州。再看大正 11 年（1922）、大正 12 年（1923）、大正 13 年（1924）、大正 14 年（1925）前四年的資料，通過考試入學新竹中學校的新竹州出身者數為：60/100、81/84、88/89、87/93（分母為錄取人數，分子為新竹州出身者錄取人數），畢竟地緣上的新竹州出身者佔絕對多數。²⁹ 不過以前四年申請入學者數目來看，仍有 1 名申請入學者來自日本內地，但最後並未被錄取。在初期新竹中學校的「生徒募集」公告上，除了應有的募集要項外，也附上考試該月份的「內臺航路汽船發著表」（即日本內地從神戶、門司到臺灣基隆往返航線的船隻名稱與出發抵達時刻表），顯現出當時臺灣的中學校亦必須對內地人發出招生公告。³⁰ 以新竹中學校前四年的例子來看，仍有一位內地日本人渡海來應考，可惜沒有獲得青睞。

新竹中學校是全然採取內臺人混合式教育，只錄取男生，第一年錄取的 100 名學生當中，內地人（日本人）68 名，臺灣人 32 名（32%）；³¹ 如果以 1937 年的內臺人學生總數來看，內地人 329 名、臺灣人 237 名（另高砂族 1 名），³² 臺灣人約佔 42%。或許 30-40 餘%是臺灣人大致上在新竹中學校所佔的比率。

²⁷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頁 173。

²⁸ 新竹州，《新竹州報》第 188 號，1922 年 4 月 6 日。

²⁹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頁 174-175。

³⁰ 新竹州，《新竹州報》第 188 號。

³¹ 新竹街役場，《新竹街要覽》（新竹：新竹州，1923），頁 69。

³² 五味田恕，《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臺北：臺北印刷株氏會社，1938），頁 8。

三、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學生來源與新竹中學校

新竹中學校的畢業生或尚未畢業的四年級生如果想要「力爭上游」進入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³³ 必須爭取每一年僅有的 120 個名額（定額 160 名扣除直升的尋常科 40 名額）。到底每一年有多少新竹中學生得以打敗前述所列臺北一中、臺北二中等 14 所中學校（不計最後設立的臺東、宜蘭、彰化三所中學校）學生而進入臺北高校高等科？

以下根據臺北高校同學會於 1977 年 6 月發行的《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會員名簿》，自昭和 3 年（1928）3 月畢業的第一屆畢業生到 1946 年 9 月第 21 屆畢業生欄中所記載的出身學校（包括臺高尋常科、中學校畢業或 4 年級結業生，以及來自內地中學校或其他），整理出「臺北高校高等科學生來源一覽表（臺灣人）」（表一）。此學生來源一覽表只以臺灣人為統計對象，因為臺北高校同學會是以臺灣人為主的老同學會組織，有別於以日本人為主的「蕉葉會」組織，因此並沒有納入日本學生的名單（日後再嘗試分析日本同學部分）。當然畢業者名單也不代表等同於入學者名單，但本文暫以畢業名單作為分析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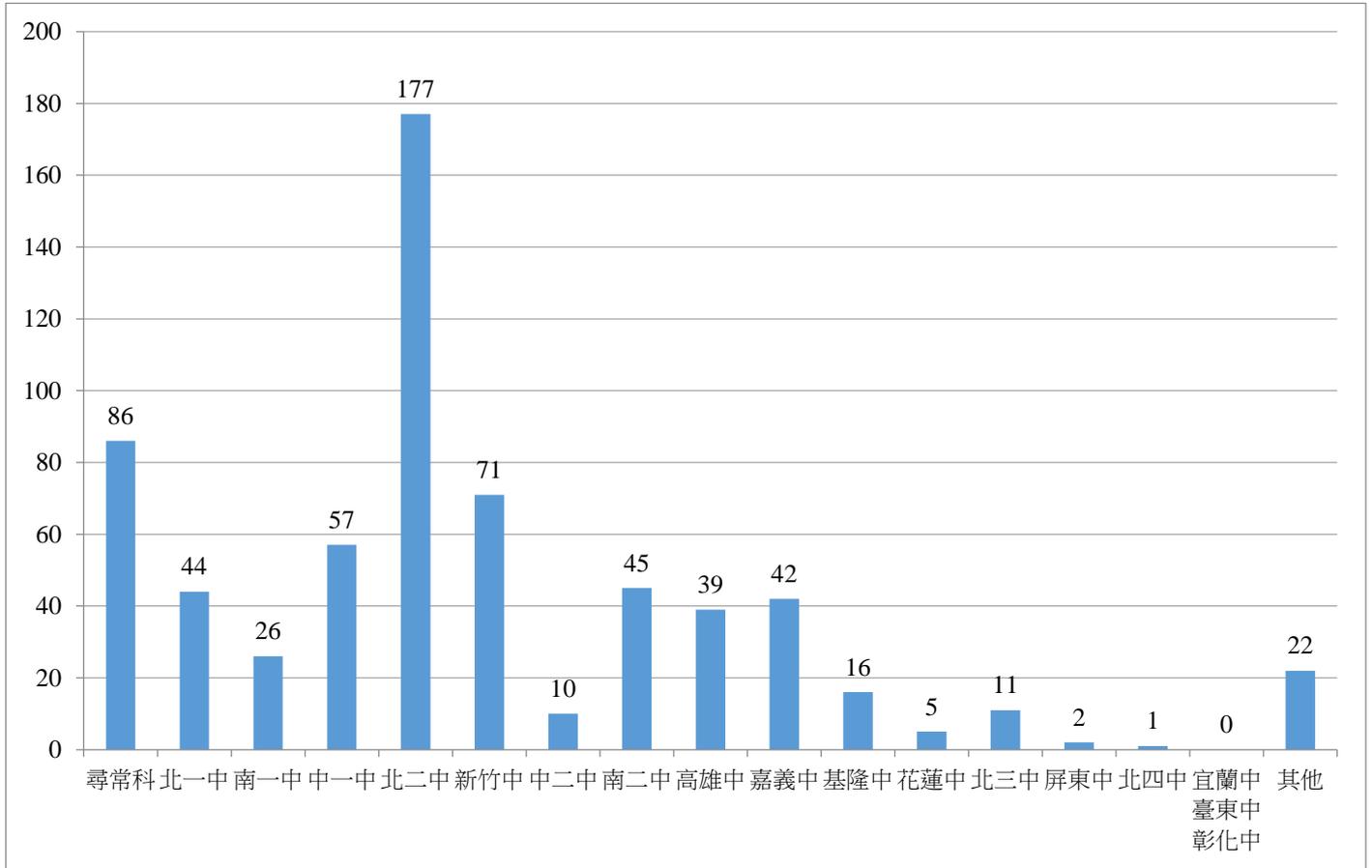
在表一中，可以看到全部 21 屆共 654 名臺高高等科臺灣人畢業生，除了 86 名尋常科臺灣人以及其他 22 名（含私立中學校、內地中學校或不明者）之外，³⁴ 戰前總督府於臺灣設立的公立中學校 17 所之中，去除在戰爭末期始設立的臺東、宜蘭、彰化 3 所中學校，尚未有學生考上臺北高校高等科外，其他 14 所中學校中，如以考進臺高的學生數多寡排名，第 1 位是臺北第二中學（177 名），第 2 位是新竹中學校（71 名），第 3 位是臺中一中（57 名），第 4 位臺南二中（45 名），第 5 位臺北一中（44 名），之後依次是嘉義中學（42 名）、高雄中學（39 名）、臺南一中（26 名）、基隆中學（16 名）、臺北三中（11 名）、臺中二中（10 名）、花蓮中學（5 名）、屏東中學（2 名）、臺北四中（1 名）。

³³ 五年制的中學校學生，在尚未畢業的四年級修了時，即可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高校，此正與臺北高校尋常科修習年限為 4 年符合。

³⁴ 另有 5 名尋常科臺灣人學生，在終戰時尚未畢業，故不在計算之內。

排名第 5 位的臺北一中和第 8 位的臺南一中，因為學生以日本人居多，相對臺灣人學生數較少的緣故，考上臺高的學生數也不多；而居第 1 位的臺北二中，學生主要以臺灣人為多，且臺北為首善之地，因此能考上臺北高校者達 177 名。

以內臺人共學、而臺灣人學生數約佔 30-40 餘%的新竹中學校，入學臺北高校的人數高居第 2 位的 71 名，平均一屆約有 3.4 名考入臺高，頗令人刮目相看。表二為考上臺北高校的新竹中學校學生全部名單，這裡面有不少是中學校四年級時，即以同等學力考上臺北高校者，例如：臺高第 2 屆的曹欽源、楊金旺、黃瀛澤、第 3 屆的賴順生等等。這些學生當中也有不少是（或可能是）兄弟檔、堂兄弟檔，如傅祖德·傅祖深、楊思標·楊思懷、邱永傳·邱永聰、羅時熙·羅時達、傅彩沂·傅彩壠、李子賢·李思賢（加上尋常科的李舉賢共兄弟三人）、陳秩宗·陳炯宗·陳圻宗。



圖一 臺北高校高等科學生來源柱狀圖

表一 臺北高校高等科學生來源一覽表（臺灣人）

	尋常科	北一中	南一中	中一中	北二中	新竹中	中二中	南二中	高雄中	嘉義中	基隆中	花蓮中	北三中	屏東中	北四中	臺東中 宜蘭中 彰化中	其他	合計
第1屆 (1928.3)	0	2	0	1													1	4
第2屆 (1929.3)	2	1	0	4	5	3	1	3	2								1	22
第3屆 (1930.3)	1	0	1	7	3	1	0	6	5								1	25
第4屆 (1931.3)	3	2	3	3	5	3	1	5	2								2	29
第5屆 (1932.3)	2	3	3	1	8	3	0	1	3	1							0	25
第6屆 (1933.3)	6	8	0	2	10	6	1	2	2	0							1	38
第7屆 (1934.3)	5	2	0	4	11	4	1	4	2	3	0						1	37
第8屆 (1935.3)	6	3	1	2	5	6	1	3	1	0	3						1	32
第9屆 (1936.3)	5	1	0	3	6	2	2	1	3	3	2						1	29
第10屆 (1937.3)	4	1	2	3	11	6	0	1	2	2	2						1	35
第11屆 (1938.3)	5	3	0	4	7	6	1	1	5	4	2						1	39
第12屆 (1939.3)	5	1	3	5	10	8	0	2	2	3	2						0	41
第13屆 (1940.3)	4	3	5	2	3	3	0	3	1	2	0						0	26
第14屆 (1941.3)	5	2	0	1	11	3	0	0	1	2	0						1	26
第15屆 (1942.3)	5	1	1	2	9	2	0	4	0	5	2						0	31
第16屆 (1942.9)	6	3	1	0	14	4	0	0	2	2	0	2					2	36

第 17 屆 (1943.3)	5	2	1	0	13	2	2	1	0	3	1	1	3				2	36
第 18 屆 (1944.9)	4	3	1	1	8	1	0	1	0	2	1	1	1				0	24
第 19 屆 (1945.3)	3	2	3	2	10	1	0	1	1	1	0	0	2	1			0	27
第 20 屆 (1945.10)	4	1	0	3	8	2	0	0	1	3	0	1	4	0			1	28
第 21 屆 (1946.7)	6	0	1	7	20	5	0	6	4	6	1	0	1	1	1		5	64
合 計	86	44	26	57	177	71	10	45	39	42	16	5	11	2	1		22	65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會員名簿》(1977年6月)。

說明：「其他」欄為來自私立中學校（如淡水中學校）、日本內地（如福岡縣中學修獻館、岡山金川中學校）、檢定或無法研判者。

表二 新竹中學出身・臺北高校生名單（臺灣人部分）

第2屆	曹欽源、楊金旺、黃瀛澤
第3屆	賴順生
第4屆	陳加祥、葉松興、傅祖德
第5屆	蔡蔭棠、 <u>范姜新淇</u> 、 <u>陳雙祿</u>
第6屆	黃繼圖、李子賢、林炳章、吳敏增、 <u>張椿蘭</u> （長良光洋）、徐堯輝
第7屆	黃明發、 <u>林維吾</u> 、 <u>林逢沅</u> 、林建章
第8屆	<u>郭進祿</u> 、 <u>邱德魁</u> 、 <u>鄭培禮</u> 、 <u>陳燠堂</u> 、陳春財、楊錦章
第9屆	黃金穗（郭金穗）、 <u>楊李拱屏</u>
第10屆	古廷正、詹益謙、徐俊貴、羅慶鈞、 <u>劉兆堂</u> 、劉梓榮
第11屆	<u>邱永傳</u> 、邱思忠、吳添枝、 <u>宋瑞樓</u> 、賴肇東、林玉聲
第12屆	吳安瀾、 <u>楊思槐</u> 、羅實熙、 <u>邱永聰</u> 、黃共睦、 <u>江德興</u> 、楊思標、呂榮初
第13屆	<u>蘇瑞麟</u> 、鄭光輝、傅祖深
第14屆	<u>李思賢</u> 、江萬煊、章雲漢
第15屆	陳秩宗、傅遠達
第16屆	<u>張楷</u> 、 <u>羅實達</u> 、范新皓、 <u>傅彩堦</u>
第17屆	張錦樂（張金二郎）、 <u>杜慶壽</u>
第18屆	陳炯宗
第19屆	陳圻宗
第20屆	彭源昌、彭錦鷺
第21屆	<u>劉文燕</u> 、 <u>傅彩沂</u> 、 <u>彭廷幹</u> 、翁林英、范光宙
共計	71名

說明：名字底下畫線者為現今新竹高中留存「學籍簿」中，查得到學籍簿資料者。臺灣人，共23名。

四、從新竹中學校學籍簿探討入學臺北高校的學生背景

現今新竹高中還留存有日治時期新竹中學校的學籍簿，且似乎已全部掃描建檔。但也許是因為保護原始檔案，或「個人資料保護法」關係，新竹高中無法提供筆者調閱原始檔案、或觀閱全部掃描檔，所以筆者只能間接取得部分「需要」的學籍簿資料，並動員學生以手抄寫，再進行分析。³⁵

³⁵ 感謝新竹高中圖書館主任黃大展老師事前協助一一檢查學籍簿資料，分別列出「查無資料」、「異動生」以及「有學籍成績」者三部份名單，並騰出圖書館部份空間，提供筆者與學生抄寫學籍資料，謹此誌謝。

根據新竹高中提供的部分學籍簿資料，與臺北高校有關係的臺灣人中學生部分，據查「無資料者」29名，「異動生」（指四年級時即考上臺高者）23名，而有學籍成績者23名，合計75名，扣除其中4名資料有誤非臺高生者，實為71名，與臺北高校同學會名簿資料吻合。³⁶

這些學籍簿資料表格，正面如圖二所示，背面則如圖三。正面的部分記載學生名字、日文讀音念法（振り仮名）、出生年月日、入學・畢業年月日、出生地、入學前學歷、本籍族稱（如廣東族、福建族）、戶主氏名、與學生關係、現住所戶主、業務（即職業，如農、商、會社員、教師等）、保證人、家族情形（如祖父母、實父實母、養繼父母年齡、職業、兄弟姊妹）、父兄資產程度、各學年教養上應參考事項、級長及校友會役員、賞罰。背面則登載各學年各科學業成績與操行、及格落第、席次（班級總學生數和名次）、勤怠（每學年出席日數）、體格（身高體重、營養、脊柱、視力、眼疾、聽力、耳疾、鼻疾、齒牙、其他異常疾病等）。

依據這23份學籍簿資料（雖然名單資料不夠充分僅佔32%，名單詳見表二名字底下劃實線者），戶長職業為農業者2名、貸地業者（地主）10名、教員2名、會社員3名、商人2名、醫生2名、公務役員2名。戶長（或父兄）職業為貸地業者（地主）可說佔最多數，也有父兄被註記為「通霄第一的資產家」之雜貨商，或資產「10萬圓」者，這23位學生家戶長除了2位是註記為「田畑作」之類的農夫外，其他為醫生、教員、會社員、公務役員，可說是資產相當或中產以上、教育程度不錯、某種程度懂得日本語文的家戶長。

例如前述李子賢、李思賢以及尋常科的李舉賢三兄弟，父親李良弼為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來曾擔任新竹市會議員、新竹市表町區區長，叔父李濟臣為貸地業者，資產雖中上，但頗重視教育，因此三位小孩前後均進入臺北高校，之後長子李子賢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成為律師；二子李舉賢進入東北帝

³⁶ 新竹高中另外提供日本學生的資料，包括：「查無資料者」14名、「異動生」5名、「有學籍資料者」8名，共27名，因資料數過少，且目前尚無比對的更進一步資訊，故暫時不做處理。

國大學工學部、後為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戰後為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四子李思賢，名古屋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戰後任新竹市衛生院院長。³⁷

不過，如果從學籍簿的成績欄來看，並非所有能夠進入臺北高校者，均是同儕中的佼佼者，有些反而只是中等成績。以最後一年（第五年級）的成績來看，例如 19/58、20/57、14/57、24/61、3/61、15/59、7/60、11/53、8/77、42/87、2/113……（班級名次/班級學生總數）。雖然有全班 113 位學生中第 2 名者，但也有 42/87 者，換言之，在學校的成績並不代表一定能或不能考上臺北高校。從上述所列成績看來，考上臺北高校者，在新竹中學校階段反而是中上成績者居多。或許還需要進一步從國語（日本語）、歷史、數學、理科等考試科目相關成績的細膩分析著手，才能較清楚理解中學成績與考進臺北高校之間的相互關係。

總之，目前以 23 位學生的學籍資料作為分析的初步資料庫，暫時只能觀察到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校生的初步容貌，此有待日後挖掘更進一步的資料，作更深層的分析。

五、結論

以上為本論文針對日治時期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北高校生（臺灣人）的初步探討。新竹中學校與臺北高校都是在大正 11 年（1922）創立。3 年之後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開始招收學生，但是新竹中學校的學生（此時最高學級僅 3 年級）尚沒有資格應考，隔年新竹中學校開始有 4 年級的學生以同等學力應考，初次應試即有：曹欽源、楊金旺、黃瀛澤 3 位考上，隔年再有賴順生 1 位入學臺高高等科。從昭和 4 年（1929）臺北高校第 2 屆畢業生起，新竹中學校可以說都有學生考入臺北高校，多則 8 位，少則 1 位，終 21 屆總數 71 位，是

³⁷ 資料來自李良弼之「李家族譜」。

日治時期臺灣 17 所中學校中，僅次於臺北第二中學校（177 位）的中學。

位於新竹街的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族群人口以客家人居多。客家人善以族群團結和晴耕雨讀、培育子孫讀書上進為人生標的，或許這些都是新竹中學校在臺北高校高等科升學成績令人刮目相看的因素之一。在 71 位新竹中學校出身的臺高生方面，已為人熟知的曹欽源、賴順生、黃繼圖、李子賢、李思賢、楊思懷、楊斯標、呂榮初、宋瑞樓、蘇瑞麟、江萬煊之外，到底有多少位是客家人出身，尚值得進一步探討。如果加計新竹中學校所在的新竹州，在初等教育的小、公學校畢業之後，直接考上臺北高校尋常科的名單來看（例如：劉潤才、李舉賢、呂耀樞等），新竹區域的文風是深深值得吾人去探究的。另外，幾位出身新竹的新竹中學校—臺北高校畢業生，其父執輩多出身於日本治臺初期所設立的國語學校或醫學校，如李良弼、黃旺成等，可以看出日本近代新式教育似乎已經受到臺灣人的「肯定」，而成為日治時期臺灣新一代知識份子，對其兒孫立身處世的新捷徑。有關這一部分，有待日後繼續分析研究。

引用書目

五味田恕

1938 《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臺北：臺北印刷株式會社。

井出季和太

1937 《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吉野秀公

1927 《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佐藤源治

1943 《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吳建堂編

1982 《臺高會名錄》。臺北：臺高會。

津田定次郎

1971 〈竹中六人の校長先生〉，《竹葉會會報》5。

徐聖凱

2012 《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高橋佐門

1986 《旧制高等学校全史》。東京：時潮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檔案室典藏

《師大檔案》。「為據請燒毀前臺北高級中學部份文卷一節核復知照並轉知由」，檔號 0390000674-01。

《師大檔案》。「為前臺北高級中學檔案處理辦法電希遵照由」，檔號 0400000991-02。

《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會員名簿》。

《竹葉會會員名簿》5。

張文義

1996 《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曹永洋

1993 《噶瑪蘭的燭光——陳五福醫師傳》。臺北：前衛。

黃天才、黃肇珩

2005 《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臺北：聯經。

新竹州

1922 《新竹州報》第 188 號。

1923 《新竹州要覽》。新竹：新竹州。

1926 《新竹街要覽》。新竹：新竹州。

新竹高級中學典藏

《新竹中學校學籍簿》。

臺灣總督府編

1924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 第二十八編》。臺北：臺灣總督府。

蔡錦堂

2007 〈日本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亞東關係協會編，《2007 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殖民化與近代化—檢視日治時代的臺灣》。臺北：外交部。

羅慶謀

1971 〈張棟蘭先生七秩晉一壽宴記〉，《竹葉會會報》5。

A Study of Taihoku High School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Chin-tang Tsai

Abstract

Using the “Student Registration Book of Shinchiku County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in the collection of National Hsinchu Senior High Schoo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os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of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who graduated to Taihoku High School.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chools and the process of elite educ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produce a clear picture of elite education in Taiwan’s mod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Taihoku High School, the “predecessor” of today’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as one of 38 high schools establish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e-WWII throughout the Empire of Japan for development of elites, and was the only one established in Taiwan. In principle, graduates from Taihoku High School were given the privilege to advance to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he only university in Taiwan at the time, or the imperial universities of Tokyo, Kyoto or other major Japanese cities without taking any form of examination.

The senior class of Taihoku High School admitted only 120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every year, graduated from 17 middle schools throughout Taiwa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how fierce the competition was in the school admittance examinations among these low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wher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studied

together, was established in 1922, the same year Taihoku High School was founded, and closed in 1945 when WWII came to an end. During its twenty-some years of operation, 71 Taiwanese students graduated to Taihoku High School. The number of Japanese students was smaller than this.

The “Student Registration Book of Shinchiku County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in the collection of National Hsinchu Senior High School is used as the primary historical source of statistical data. By combining the registration book, the remaining collection of old books at these two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curricula, the relationship and content of elite education connecting these two schools are constructed.

Keywords: Taihoku High School 、 Shinchiku Middle School 、 Student Registration Book 、 Elite 、 Middle School